

# 美國對華政策——艾奇遜之自白

居 仁 譯

(編者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對華外交政策的輕忽，已造成了極為嚴重後果，中國人民則受損尤重，目前，我們正在含淚吞食着此項苦菓。

美國的錯誤政策，至「白皮書」時期乃為其高潮，當時外交決策主要人物艾奇遜(Dean Acheson)，自有其親歷經驗，艾氏在其最近出版的回憶錄中，對此有較詳盡論述。本誌茲特敦請居仁先生，將艾氏新著摘要譯出，俾使國人對於影響中國人民至深且鉅的當年美國對華外交政策，有進一步瞭解。

本誌推出此一連載譯文，在時間言應不算太晚，因為原著在去年底甫出版；在譯者人選言是適當的，因為我們經過鄭重敦請；至於我們的心情，則是沉重的，那是因為我們無從知道人們是否普遍具有重視教訓的智慧，與接受教訓的勇氣。

艾奇遜(Dean Acheson)在一九四一——四五年擔任助理國務卿，一九四五年八月升任副國務卿，到一九四七年六月辭職，一九四九年初出任國務卿，迄一九五三年初和杜魯門總統同時退職。這是美國在戰時和戰後最重要的決策時期，對於戰後世界固然有很大的影響，而我國大陸淪陷前後，也正在這段時期之內，並且正是在艾氏擔任國務卿的任內，所以對我們更是一個有決定影響的時期。

去年年底，他的「裏贊創造——我在國務院的年頭」(Present at the Creation—My Years in the State Department)出版，算是他的回憶錄，也是他的自白。從書名，便知道

他是如何的自負。他在扉頁的背面，印上西班牙王阿爾豐梭十世(Alfonso X)的話：「當上帝」創世時，如果我在場，我就會做若干有益的提示，使宇宙有更好的秩序。」他又在序文中說明，在戰後幾年裡，在某些意義上也可以算是一個創造的時期，對於所創的秩序，他是和其他參加創造之人，共同分擔一部分責任的！這便是他原書命名意義所在！好大的口氣！

艾氏出身於耶魯和哈佛大學，在傳統由平庸人才當政的美國政治圈裡，也算得上是一個小有才氣分子，無論如何，要比他的「老闊」杜魯門略高一籌。他又是少年得意，所以自負不凡，並且也有些剛愎自用。在這一部原書裡，充滿了

冷嘲熱諷，譏笑他人的尖刻文字。只以杜魯門關於外交凡事向他請教，一切對外政策表面上由杜氏決定，而主意則是艾氏所出。沒有杜魯門，他大概做不了國務卿；沒有杜魯門的知遇，便當了國務卿，也不能如此的紅得發紫；沒有杜魯門的庇護，他很難在國會嚴譴之下，還能立足。所以他把杜魯門捧上三十三天。也許他感覺到，如此捧法，恐怕別人不易信服，所以又說：「如果我不是一個偉人，他總是一個最偉大的小民……」

他們東伙二人所「創造」的世界秩序，究竟如何呢？二十年來歷史證明了並不理想，不僅此也，殘酷的事實又說明了他們當年的決定是錯了。這些，在艾氏的大書裡，倒也不諱言。不過艾

氏仍然有幾分口硬。他說，「後見之明」，並不能使人有慶幸重生的快感，像在雪山裡被困的人遇到聖貝爾納德(St. Bernard)義犬來搭救一樣，因為後見之明並不能使人在事前可以提出有效的更好的辦法云云。他仍然以為他們的決定，雖不成功，但總算是最好的失敗！政治家大權在握，做錯了事，遺害世界，削弱本國，下台以後，兩肩一聳，寫幾本風涼詞，為自己和自己的政黨，文過飾非，還可以坐享鉅萬的版稅，所謂民主國家的政治責任，也不過如此而已。

艾氏不否認，他是偏袒英國的；他也不否認，他被人指責為國務院裡一小組「激進分子」的頭子。又加上，美國民主黨當權分子與中國國民黨交惡，必欲去之而後甘心，親共分子乃得恣意滲透。所以，我們的國運，在這惡劣環境裡，幾乎是注定了要遭殃的。

那麼，艾氏這部書，對我們而言，還有什麼可讀的呢？有的！第一，當年美國對華政策，究竟是如何決定？有些細節，我們至今還不甚了了，在這本自白裡，可以找到不少的消息。第二，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已經吃了大虧，我們也應當反省，這番教訓應當永記心頭。第三，書裡有涉及美國基本國情之處，我們應當特別注意。那是美國不管那一黨所共有的基礎，難於推翻。而且，便算是共和黨對我們比較瞭解一些，誰也不能阻擋民主黨不再上台。這些下台政客所寫的(或是請槍手寫的)回憶錄等等，除了賺版稅之外，還有一個目的，便是為他們自己的政黨辯護，以期捲土重來，艾氏這部書正是如此。他的序

言標題便是“Apologia pro libro hoc”(為此書辯護)！絃「上」之音，可想而知了。

東方雜誌，以最迅速的方法，獲得此書，借與鄙人，先睹為快，並囑撮要發表。因有他事，本無意於此。只以義不容辭，勉為其難。但須首先聲明，關於原文的選擇剪裁，乃至譯者附註，概歸本人負責，與東方雜誌主持人無涉，幸勿誤會。

我們所最注意的，自然是美國對華政策部分，所以先摘譯這一部分，陸續發表。至於其他部分，以後再說。

正文儘量依照原文，第一人稱亦保留與艾氏本人或其同人，譯者如有意見，另行加註，或列入括弧之中，以資辨別。外國人名儘量採取通用譯稱，或其官方自定漢名，惟以記憶不周，容有謬誤，敬希讀者諸君不吝提示，以便隨時更正，是幸。

——摘譯者

第一卷 學習之年 助理國務卿時期(一九四一——四四)

一、初進國務院

(1) 任命與報到

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爆發後，美國輿論分為兩大派系，爭論不休。一派由美國第一委員會(the American First Committee)領導，代表傳統孤立主義的看法。另一派集權在援助盟國保衛美國委員會(the 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the Allies)的旗下，我(指艾氏，以下同)是加入這個委員會的。不久我便超出了辯論的範圍而捲入實際行動，協助促

成英美以基地交換驅逐艦的協定，並且在白宮裡草擬一九四〇年總統競選講稿。這些，我都在「晨與午」(Morning and Noon)(意指少年與壯年回憶錄)一書中說過。這些工作惹起赫爾(Cordell Hull)在一九四〇年十二月邀約我擺脫我的與隆而愉快的律師生涯而進入國務院做他的助理(國務卿)，主管經濟事務。

我當年四十七歲，算是中年的中年。這分官差以及重返羅斯福政府做事，對於我都提不起興趣。羅斯福的政府，我是在過的。一九三三年我當過財政部次長，並且在伍汀(Woodin)部長有重病時，代理部長六個月，終至和羅氏大抬槓而辭職回家了事。雖說這幾年來算是和解了，羅氏也寬大為懷，想法誘引我重返公職，我都婉謝了。我對這位總統的態度是有崇敬而無友愛。

可是，歐洲和亞洲的戰局變化得很快，在我看來，就要為美國和她的盟邦帶來災難。總統和一大部分政府中人以及全國似乎是淪陷於癱瘓之中，又憂慮而又不知如何行動。因此，我就毫不遲疑的辭掉了我深切心愛的律師事務所的事。一九四一年二月二日報到，當了助理國務卿。

(2) 世界大局

回溯一九四一——一九五二年這一段時期，世情是相當幽暗模糊，未來的變化更不清楚，當事人只是在摸索揣摩而已。此外感到最迫切的兩個危險，一個是蘇聯新造成的權力和向外擴張的帝國主義，另一個便是核子武器。

(一個自命為鑿贊創造世界秩序的人，對於所處環境，尚不清楚，其所「創造」，焉得不糟

。不過，說起來，艾氏還算有幾分老實！)

甚至連我們捲入漩渦的歐洲與亞洲戰爭的正性質，我們在國務院的人以及我們美國公民們，也都不清楚。一直到我們離開了任所以後，纔由一個明察秋毫的觀察人(Desmond Donnelly, M. P.)指出，歐洲的戰爭就是「歐洲內戰」。

滑鐵盧以後，一百年間，德國的實力猛進，德俄的相對地位也起了變化。一八一四年，歐洲各國的聯合力量可以阻止法國稱霸。一百年後，也有人以為這聯合的力量同樣可以阻止德國稱霸，這證明是錯了。到了「一九一七年，很明顯，這是辦不到；於是美國參與以阻止德國統治歐洲。

一九三九至一九四五年之間，希特勒再度嘗試。德國人兩次冀圖稱霸歐洲就構成了三十年的生死爭扎，中間只是一度暫時休戰而已，歐洲的那些大帝國互相消滅，而十九世紀歐洲人統治的世界也隨之瓦解。本書所述的事端，起於歐洲內戰結束前四年。彼時奧國們及奧斯馬加兩大帝國早已過去。沙皇俄羅斯帝國則為革命的蘇維埃獨裁政權所取代。法國敗績解體，本土被佔領，其亞洲殖民地落入日本人手中，非洲殖民地則勉由維琪政權撐持着。英國奮勇作戰，流血垂斃。德國雖已失去歐洲以外的殖民地和屬土，但是把歐洲組織起來，置諸掌握，則是拿破崙所未能做到的。希特勒的統治東起波蘭與比薩拉比亞(Bessarabia)，西迄比里尼斯半島與大西洋。

美國不但參與了歐洲內戰，也捲入亞洲內戰的漩渦。十九世紀中歐洲和美洲飛躍進步，而中國則有相反的成果。那兒，四千年的文化與政治

體系，曾經圓滿的維繫着廣土家民的大國，在遇到了西方，和它的騷擾成性的後代，日本的打擊之後，隨之解體了。最後連國家領土的完整都保不了。

天主教傳教士早在十六世紀就從歐洲進入中國，而且歐洲與中國這兩地地區，是彼此相知的；可是一直到了十八世紀，才有相當數目的商人跟着前往——美國第一條船是在十八世紀末到達的——而中國的藝術，建築與思想，乃至東印度公司所輸入的中國產品，在歐洲、在美國都曾佔過時髦地位。最初商人只限於廣州和「公行」做生意。歐洲人屢次與中國官方談判，都不得要領。

不久，這些西方的和日本的「夷人」發現了這個天國是無法經過談判而打通的，於是在百年之間，假手五次戰爭，贏得了他們的約訂通商口岸，租界，投降以及勢力範圍，等等。無數的留學生以及繁華的金融和工業中心如上海，香港等地所帶來的新觀念，動搖了古老的(生活)方式和信守。一九一一年慈禧太后去世以後，這搖搖欲墜的滿洲帝國，一經革命觸發就崩潰了。袁世凱想以共和國維繫中國，一九一六年逝世之年，他五年的努力是落空了。(譯者按，艾氏竟不知洪憲稱帝的事，難怪那些年輕的左傾「中國通」能在他面前信口雌黃了！)這個歷史人口最多領土最大的國家，四千年後竟變成一個地理上的名稱，靜候新主子來征服其全部或一部，悉憑機運！

日本人在別國人忙於他事的時候，對於這種機運正是虎視眈眈。一九〇四年，在遠東擊敗俄國

以後，(譯者按，日俄於一九〇四年開戰，一九〇五年結束)繼承了俄國在南滿與高麗的權益，五年後更吞併高麗。在歐洲內戰開始時期又有機會從德國人手中奪取山東半島。接着美國鑄成一個大錯。許士(Charles Evans Hughes)是一個有才之士，但是他做美國最高法院法官的聲譽應當強於其為國務卿。一九二一年華盛頓會議時，他急於中止英日同盟，乃同意限制海軍軍備及太平洋島嶼禁止設防，坐使日本在西北太平洋獲得軍事優勢。(譯者按，據許多史家的看法，美國的大錯是在巴黎和會鑄成的。艾氏可能是知道的，不過那是民主黨搞的，他或許有難言之隱！

華府會議是共和黨政府發動來收拾善後的。所以艾氏在註文裡引述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之說，以為支持，便有點文不對題了。)

日本不久便利利用這優勢了。中國如上文所述，分而復合，合而復分，隨着軍閥此起彼落的興衰，變動不已。在這近於無政府的表面狀態之下，兩種組織原則是在爭雄——就是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一九二三年兩者合併。鮑羅廷(Mikhail Borodin)從莫斯科到廣州，協助孫中山建黨以創造一個現代獨立的中國，不受外來干預，可能俄國除外。起初這運動迅速成功；當其勢力北移之時，其領袖內訌。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在蔣介石領導之下，以血戰肅清共產黨，後者經過幾年戰鬪，流竄到中國的西北，尋得逃遁之所。國民黨進入北平，統治中國。

可是對日本人而言，這就到了應該阻止這個民族統一運動的時會，遲則無及了。在一九三一

與三二之間，他們佔領了滿洲全境，組織起一個分離的，在日本保護之下的國家。一九三二年襲擊上海，在國際聯盟裡引起叱喝，調查和決議。（譯者按，當年在會議席上叱喝的是日本人！）日本人置此不顧，一九三四及三五繼續向華北，華中進軍。此後兩年又向華南前進。到了一九三八年，國民政府已屈處於中國本部的西南隅，而共產黨則在西北。接着，呈現一種膠着狀態。作戰的三方各別圖謀削弱其餘的兩方。可是國民黨與共產黨是力有不逮，而日本人則憂慮美國日漸敵視日本人藉以征服中國、統治東亞的那個亞洲共榮圈的口號，所以猶疑不決。

### (3) 美國的看法

一九四一年圍繞着美國人的世界大勢的性質是一回事，美國人對於這大勢的看法或想法則又是另一回事。在國民的心意裡，有兩種相反而同樣不現實的觀念互相競爭，而這兩種觀念都是淵源於美國早期的歷史。十八世紀的歐洲戰爭，往往也把美洲捲入漩渦，於是美國開國元勳們對於歐洲戰爭有一種看法，這曾在華盛頓總統任滿有名的告別辭中有明白的揭示，一九四一年時，這個原則稱為孤立主義（譯者以為譯稱絕緣主義，應更確切）。後來由於維也納公會的安排以及英國海軍支持門羅主義的關係，在十九世紀中會有較長時期的和平，從這種經驗乃另產生出普世法律與和平秩序的夢想，一度保存於國際聯盟的體系裡，後來又在聯合國組織中復活。

十八世紀的經驗 華盛頓將軍把一切歐洲戰爭看成王朝爭雄的結果，因而與逐漸自認為「美

國人」的人民無關，無論如何這是一種過於狹隘的看法。不過他也有道理，因為當時，不論是歐洲人或美國人都是如此想而且是如此稱呼那些戰爭的。如大同盟戰爭便稱為威廉王的戰爭，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為安娜王后戰爭，奧地利皇位繼承戰爭為喬治王的戰爭等等，因此華盛頓囑咐他的同胞，避免歐洲的糾葛。

其實十八世紀戰爭是有更深的理由，不僅是王朝的爭雄。法國的強權曾有一百二三十之久，不管是操在波旁王室，法蘭西共和國或拿破崙帝國之手，都以無限的活力，在歐洲、北美、西印度、中東以及南亞，追求霸位。即在北美也具有侵略性，要把英屬殖民人限制在大西洋與亞利加尼山東麓之間。這長期鬭爭一直到滑鐵盧一仗才停止。

十九世紀的經驗 與英法三國的大政治家（Metternich, Castlereagh, Talleyrand）解決了對法戰爭的問題。始於維也納，成於巴黎，使世界有一個世紀的國際和平與技術和經濟發展，大於人類從發明船帆與車輪以來的整個時期所造成的。但是華盛頓的忠告能為人所遵守，要等到坎寧（Canning）出世，才能實現，而且是不可避免。他核准以英國的艦隊作門羅主義的後盾，這樣才能讓分散在各處的九百萬美國人——他們的人口中心不過在他們首都偏西幾英里，而且首都當時也只是和他的國家一樣的筆路藍縷——着手開拓一個生疎大陸的艱鉅大業，不受歐洲一億九千萬人或其一部分人的干擾。

這樣，在全世界歸向，而且受歐洲統治的十

九世紀中，西半球才能免於殖民擴張的侵犯。但是投資則否。歐洲在幾年遲疑以後，終於敢擲下賭注，對美國投資。百年之中，「對外援助」，（譯者按，艾氏借用現代美援名詞表示「對外投資」）不斷增長，以至在一九一四年前半世紀中，西歐在英國領導之下，對外投資幾與英國全體的國民財富相當。如果美國比照英國一九一三年的情形，欲以相同比例的資源對外投資，那麼應該比這大三倍。整個馬歇爾計劃應該一年做兩回。（艾氏真不愧為「親英」的說客！）

從經濟來說，這地球真是一個世界。

美國人關於中國的觀念 在整個的十九世紀乃至更後的時期中，美國人的對華態度是既愛且恨。美國政府公稱美國的目的是「門戶開放」政策，就是說：貿易之門應該敞開——這正是當年中，國當局所不願的——而貿易的機會應當均等。美國反對私訂勢力範圍。當義和團排外，慈禧太后整批判處外人死刑的時候，美國參加軍事討伐，予以鎮壓。亂平以後，戰勝的盟國要挾中國賠款，抵償損害，而美國則保留其賠款部分為教育中國學生之用。

美國飛剪商船，馳赴遠東，原在對華貿易而博利，不亞於他人，但亦附載傳教士，開導心靈，醫療身體，以及搭救不信基督的中國人的靈魂（好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艾奇遜！只可惜在他的大著裡找不出太多的基督精神！）在我們國內，難得有一個市鎮沒有會社團體，為中華傳教會，徵集資金與衣服，為那些在遙遠的，危險的，外方的上主園地工作的人擔憂，以及等待聽取傳教會

的動人的報告。

那愛與恨複雜情緒中愛的一部分，就是如此培養起來的，這個愛的部分曾經把如許的情感灌注入我們後來的對華政策之中。也就是出源於這個背景，更後來使羅斯福總統產生了一種意向，在邱吉爾和史大林看來似乎是唐吉訶式的意向：中國，藉我們的援助，靠我們的教導，會從灰燼裡重新升起，達到一個大強國的地位，並且將於戰後扮演一個善良的角色，致成亞洲的安定。（譯者於此有兩點不能已於言：第一、關於羅斯福，艾氏未免健忘，竟不能為雅爾達的祕密賣友的勾當，自圓其說。第二、英蘇忌妒美國人對華友好甚至友愛，那不打緊，中國人心裏有數；如果美國也有這種人的，我們未免難堪。美國人對華友善，既如艾氏所說，出自於美國人普遍的要求，想來是不會錯的，但看執行之人如何了。像羅斯福為善不終，或是像艾氏之流，甚至懷疑這分情感的智慧，那就要出問題了。天下焉得不亂！到頭來，又與美國何益？）

我所描寫的美國人對於其四圍世界所懷抱的觀念與後來事端的演變顯不相干。我所參加的政府以及這個政府所服務的人民不久就經驗到，急轉直下的參戰。我要寫的故事即在於說明政府與人民怎樣自行調整，以適應那殘酷的現實的。

#### (4) 國務院裡的工作環境

以上所述是艾奇遜對於天下大局以及美國人所持態度的看法。接着艾氏對於國務院和官長同仁，也有他個人的意見。他說，國務院當時從人員數字來講，只有今日四分之一的光景。國務卿

以下在國內外轄有官員一千二百人，另外兩千九百名美籍雇員。提起國務院這所「老」大廈，當年國會撥款興建，意在作為一所全國紀念性建築物。可是國會現在對於其中的辦公人物，則並未有類此的好感。

國務卿赫爾 (Cordell Hull) 的儀表具有美國正統政治家的風範。可是他有田納西山地的傳統，他多疑，好醞釀舊恨，往往引起爭端，而且舊惡必報。他和羅斯福總統之間關係，頗不融洽，乃兩人個性不同所使然。赫爾早期注意推行自由貿易政策，而羅氏則以全力注意如何挽救國內經濟衰落。後來國際大局激變，羅斯福決策，往往不事前徵求赫爾同意。尤其一九三三年七月倫敦國際經濟會議，羅斯福的決定等於「用魚雷炸沉國務卿親身駕駛的船艦。」赫爾表面不能責怪總統，終於將羅氏所信任的一位助理國務卿 (Prof. Raymond Moley) 趕出了國務院。然而此後仍然糾紛不已。許多閣員及羅氏親信 (Henry Wallace, Harry Hopkins, Harold Ickes, Henry Morgenthau 等等) 都在侵奪赫爾的職權，乃至這位首席閣員反成為白宮最後有影響力的一位官長，艾奇遜認為這是對美國絕不會好的。

副國務威爾斯 (Sumner Welles) 走羅斯福總統的路線，不忠於赫爾，終於一九四三年八月由赫爾提請羅氏予以免職。和艾氏同時擔任助理國務卿的三人當中，以貝爾 (Adolf Berle) 與艾氏關係最惡，「彼此不歡，亦不掩飾。」至於國務院的組織，有地理區域的司科，亦

有業務性質的司科，畫分不清，職權錯綜重複。院內長官既然像封建君侯，互相猜忌；各司司長就宛如采邑邑主，各不相下。經常開會，而效率甚低。

艾氏進院以後的工作，照國務院公報所載是「協調主要政策與商務及經濟之問題」，而實際上則全不是那回事。他後來在著書不久以前才知道，原來他被邀入院，表面是赫爾出面，實際則是羅斯福下的條子。他事後仍以爲喜，因為羅氏開除的人已不算多，而開除後又被召回的則少而又少。

他當年原是看見國家緊急，懷有大志進院，事不由己，於是不得不找事工作。據他的看法，等人去做的事甚多。他一開始時所做工作中，比較重要的便是逐漸加強戰略物資出口的管制。在他到院以前，對廢鐵廢鋼及軍用飛機汽油輸日，已有限制，引起日本人的嚴重抗議，其措辭比之於後來可以脫下皮鞋敲桌子的場面，自屬略爲文雅，但在當時有禮節的外交往還時代，已算得是頗爲嚴厲的了。艾氏到職以後不久，有擴大限制範圍的必要。赫爾向來在禮拜日早晨召集高級官員，討論這些問題。當時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便是在航空汽油而外，擴大禁止一切種類的石油產品輸與日本。目的在於限制日本在東亞及東南亞的軍事行動；但是危險在於限制太嚴，反引起日本侵襲荷屬東印度，奪取石油。當時軍人主張從緩；而文人則比較膽大。「鷹」與「鴿」是後來的名詞，據艾氏自稱，他當時經常站在「鷹」派，與「鴿」派爭辯，而無成效。（待續）